

1601

巩义市文史资料

第十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巩义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一日

刘希彭先生 自序 手迹

[illegible][illegible]

序 号	公元 纪年	中 国 纪 年				主 流 位 置	决 溢 岸 别	洛 纳 位 移	洛纳或决溢地点		文 献
		朝代	年号	年 月 日	古地名				今地望		
31	1934	民国		23			东	汜水县	汜水乡	1：50000《黄河下游治理工程图》。	
32	1936	民国		25			西	巩县洛口	巩义市洛口	1：50000《河南陆测图》。	
33	1937	民国		26		中北				《汜水乡土志》：塌北岸，滩庄只剩百十户人家。	
34	1938	民国		27		北北	东			《温县志稿》：决堤夺蟒东流，河宽9里。	
35	1942	民国		31 4		北	东	孤柏咀	孤柏咀	《汜水乡土志》：黄河北流，一股汇洛河至孤柏入大河。	
36	1945	民国		34		南	西	汜水县	汜水乡	日本测量《华北写真图》十万分之一。	
37	1945	民国		34		中	西	巩县		《汜水乡土志》：垦滩，洛河由巩入荒河，南岸滩地逐年开垦。	
38	1955					中	西	巩县	巩义市	1：10000《邙山水库图》。	
39	1957					南	西			《汜水乡土志》：主流南趋，塌岸。	
40	1958			7 23	18 南	北		城南堤	城南堤	《温县志》：堤决6丈，水入城。水落后主河道仍南邙山下。	
41	1982			8 2		北		陆庄	陆庄	《温县志》：陆庄新蟒河南决堤。	
42	1983			8		北		大玉兰	大王兰	《温县志》：大玉兰堤决600米。	
41	1985			9		北		单庄	单庄	《温县志》：单庄老堤决700米。	

$\frac{2000}{2} = 1000$
 $1000 \times 2 = 2000$

目 录

政 治

解放后首任巩县县长——徐宝森同志访谈录

..... 任知时 吕士杰(1)

附:巩县 1938--1940 年发展党员资料

..... 任知时 吕士杰(14)

1936 年爱国募捐纪实 张荣贤(16)

我见到的日本“三光”政策 蔡文清(19)

“皇协军”烧杀张岭记 张世英(20)

张济超同志参加洛阳保卫战纪实 武盘石(26)

黄河边的枪声 韩维良 韩荫轩(31)

抗日战争中我的遇难记 任锡芸(35)

秉礼高小在抗日战争中的文艺宣传活动 李 江(38)

1946—1947 年的河南大学学生运动 任勋丰(43)

回忆抗美援朝片断 张保全口述 武盘石整理(59)

赴朝纪实 张丙尊口述 武盘石整理(63)

抗美援朝牺牲的赵宗元 武盘石(66)

区干部杨富贵被杀记 姚德茂(67)

区干队长赵海潮被害记 姚德茂(68)

经 济

解放前回郭镇纺织业情况 周云光(69)

讲信誉的巩县生意人 崔振普(72)

白河公兴煤矿始末 崔泽欣口述 张国瑞整理(94)

回忆农村的借地、分自留地和休养生息 赵十一(101)

文 化

西侯村的“殿子”..... 周云光(103)

旧社会戏班的分帐制·····	周云光(104)
小相狮舞村·····	周云光(106)
近百年来巩义人才史话·····	任知时(115)

社 会

礼泉村口的“陈公义桥”·····	陈洪范(134)
陈家母子遇害记·····	韩维良(136)
半截脚——刘花·····	刘彦昌(139)
张五堂自杀记·····	张荣贤(140)
张满场被害记·····	张荣贤(141)
活捉土匪头子王殿臣·····	姚德茂(144)
我所听到刘作训的几点材料·····	刘彦昌(147)
我第一次看到国旗·····	于道昆(149)
回忆柏茂乡的民主运动·····	刘绪轩(151)
万里长空初舞袖·····	傅德斌(153)

人 物

刘希彭先生自传·····	刘希彭(159)
张仲鲁·····	薛世孝(166)
刘镇华与安徽政局·····	刘亚仙(179)
韩维周先生传略·····	张欣奇(184)
真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武剑西·····	任勛丰(187)
烈士崔光润·····	武盘石(191)

地 理

洛纳及其附近历代黄河变迁情况·····	王法星(193)
---------------------	----------

解放后首任县长——徐宝森同志访谈录

任知时 吕士杰

徐宝森同志 1917 年 6 月出生在巩县康店乡焦湾村。1938 年参加革命,1948 年任巩县人民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后随军南下,又在广西奋斗 30 余年,在广西农机局任党委书记至离休。1996 年 5 月 15 日逝世,享年 80 岁。

徐老 1994 年 11 月份,偕夫人回巩探亲期间,应市政协文史委的请求,畅谈了他的革命历程和巩县早期革命史,还畅谈了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这些资料不仅对我们了解过去,理解历史,甄别史实有一定价值外,同时对我们正确理解人生观,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更具有令人信服的启迪作用。

与徐老谈话地点,约在老同志任知时家中,离徐老住的地方较远,我们认为应该用车接送,但徐老坚决不同意,当时他虽然已 78 岁高龄,但精神很好,每次都按时赶到,其中一次下着小雨,他们竟打着伞冒雨而来,使我们十分感动。

徐老讲话,没有官腔,平易近人。当吕士杰同志自我介绍是和义沟人时,他很和蔼地说:“和义沟有个邳文升,你知道吗?他可是个老党员,当过副县长。和义沟还有个常建元,弟兄三人,家有 100 多亩地,是个伪区长,但比较开明,曾为保护我们的同志出过力。”谈的非常家常,一下子把同我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丝毫不感不到他是一个厅级干部。

徐老生活非常俭朴,回巩十几天,就住在他十弟徐宝石家中,多次交待:“不要惊动市委,避免惹出麻烦,不然还要住宾馆,受招待,那就太浪费了。使我心中不安。”平时到处步行,找老同志叙家常、谈心,甚至到康店乡叶岭村,十里之远,也是老两口步行去,步

行归。他说：“人老了，有诉不完的乡情，趁还健康与老战友叙一叙。看一看家乡的变化。回来这一次，以后再回来机会就不多了。”他不吃请，不让招待，访到那里，就在那里吃家乡饭，蒜面条、小米粥、烙烙馍……非常大众化。徐老的老伴也在自治区机关工作，经济生活并不困难，但他的衣着十分俭朴，一身中式衣衫，俨然像一个“老农民”，甚至布鞋上还有一个补丁，当我们问他，你俭朴的是否有点过份时，他笑着说：“作为人，只要吃饱穿暖，达到养生目的就够了，何必讲奢华排场呢？应当知道，咱们国家并不真正富裕，大多数人才温饱，还有几千万人尚未脱贫呢！”

当市委得知徐老回巩时，李宗保书记和王海泉副书记特邀他们夫妇二人到宾馆进行座谈。座谈后准备宴请招待，徐老坚决不赴宴，市委无奈，只好委托任知时同志去劝驾，几经协商，将原订的菜削减了 2/3，只留下很简单的家常便饭才肯去吃，招待人员实在过意不去，上了四道较好的菜，徐老连动都未动。使周围的人很受感动，目前这样的干部太少了。

当徐老准备回广西时，还是不愿惊动市委接送，来个不辞而别。自己去搭公共汽车去郑州，当我们发现时，市委立即派车去送他，是在公共汽车站才找到，徐夫人正在窗口排队买票。通过我们“强请”，才坐上车到郑州。

徐老虽然是探家，仍不忘深入生活，了解不少社会上存在的问题，在与市委座谈时，很诚恳地对腐败、社会秩序、伪劣产品……群众反映激烈的热点问题，向市委语重心长地提出意见，使我们旁听者深受感动，李、王书记都表示诚恳接受。

我们在整个接待访谈过程中，深受教育和感染，“老八路”的作风又回来了。

最近接到徐老的夫人谢锦珠同志一封信，说徐老临终还交待要将临颖南街村发展的资料转给家乡，转给老同志，宣传南街，走南街道路。

原来,我们把徐老送到郑州后,他们没有立即回广西,而去南街村参观一趟,他二人是以私人身份去访问的,看的很客观。他们看到“90年代的南街,仍然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人的头脑,指导发展经济工作,并有一个好班长,带一个好班子,探索一条适合本地发展农村经济的新路子,走共同富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看到南街后,徐老心情何等愉快!本想立即复印一些资料寄回家乡。怎奈,不久就病倒入院了,一年多没有了却这个心愿。他去世后,6月30日锦珠同志将几份南街村的报导资料,寄了回来。“走南街道路,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权当是徐老的遗愿吧!一个老革命终身孜孜以求国家的富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临终还希望家乡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其心胸是何等光明!何等磊落!

现将1994年底我们访谈的资料整理出来,作为纪念。

我是1917年6月出生在巩县康店乡焦湾村。上私塾7年,读四书五经。在石窟寺新学堂上一段,曾与白延安同学。没毕业,15岁到洛阳当学徒三、四年。工作在“益晋银号”,拉风箱,铸50两重的元宝,白天黑夜干,扛白洋,一捆50多斤,铸成的元宝都运往上海去。在这期间,受蔡廷锴抗日事迹的影响,心里初步认定:“不当亡国奴!”后,“益晋银号”倒闭,我回巩,十七、八岁,买卖棉花,在焦湾买,到郑州卖,再打包运上海。这段时间,“西安事变”、“芦沟桥事变”,日本进来,在思想上引起一波波振荡。抓蒋介石时,我在郑州,就要投身革命,我带着几捆棉花到武汉去找八路军办事处,可没找到。回巩后,认识了张雪林。张雪林当时在二小教书,经常到我家,给我送《新华日报》、进步书籍让我看。我自己也买了些书籍读,像邹韬奋的书都读过。大约在1937年冬或1938年春,巩县成立了第一个地下党支部,地点在东黑石关完全小学校。当时的党支部成员3人:张雪林(即张正兴),巩县新沟人,在开封上高中,是偃师张如意发展的,那时偃师是中心县委;徐宝玉是在洛阳八中被吴芝圃、

陈少敏发展的。当时予西特委的吴芝圃、陈少敏都在洛阳八中教书，他们介绍了年仅15岁的徐宝玉入了党；再一位就是孝义大王沟上边邮政局的一名邮差，这个人后来走了，我记不得他叫啥啦。

东黑石关党支部是巩县最早的共产党组织，徐宝石是36年入党，张雪林是37年冬或38年春即在成支部前刚入党。以后他们在巩县发展党组织，王桂五就是张正兴发展的。我也是张正兴发展的。1938年夏天，形势紧张，党组织受到威胁，张正兴就到偃师老城学校教书去了。这时，崔济民回来。张长安、张士杰去找我，让崔济民给我们写了介绍信，一块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在那里住了两个晚上，经胡乔木介绍，我到了延安青年训练班。

那次我县去延安的是五个人，一个叫张长安，后来他参加了新四军，在打仗中牺牲了，一个叫张士杰，上抗大，毕业后，在部队当指导员，曾在邯郸、武安一带工作，后回家务农；一个叫谢清铎，由西北办事处介绍到抗大上学，可毕业后，也回家了，他只是同情革命，后来他到蔡家坡工厂当工人，正好他的厂长曾是延安兵工厂的工人，认识他，就奇怪他一个“抗大”学生咋就会来当一个普通工人！另外两位就是我和谭进宝，我们都是延安青训班的，结业后，都一块回到巩县。到家后，谭不干了。我去偃师老城找到张正兴，张把我介绍给王桂五。

后来西村有个秉礼学校，学校校长赵建玉（又名赵朝田）是共产党员，此校还有学生中党员王同章等，他们在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中开展工作，发展党员。赵朝田是在开封上学时入的党，国民党通缉他的命令来到巩县，在县府干事的赵士敏知道了，马上通知学校把“田”字改成“由”字，赵朝田便成了赵朝由，以“此地没此人”为由挡了回去，据说当时的督学赵有光知道此事，但他倾向共产党，或者说是同情吧，他在上边来查询此人时给予隐瞒。赵有光曾是东黑石关完小校长。有个进步教师姓周，要被抓了，他及时送信儿，并把周老师的书籍迅速转移，使周老师脱离虎口。赵有光一次到北侯查

学,教师王中烈(偃师人)在课堂上问学生……“谁好?”学生说:“共产党好,八路军好。”赵有光对同在的赵建玉说:“这种表现太明显了”。日本鬼子来时,赵有光在教育局干过,有汉奸嫌疑。所以,在解放后没用他,也没查清楚他的问题。

1939年2月,我去竹沟上党校,那时彭雪枫是河南省省委书记,我见到彭,是彭让我去上党校的。这个党校对内是党校,对外是新兵大队,属中原局与河南省委管,我在那里经常见到陈少敏(省委组织部长),项明(),朱立治(中原局书记)。范文澜在那上历史课。当时,范非党员,是河大教授,口音不懂,写在黑板上,没教室,坐在树荫下,几百人一块,省委宣传部长王兰西也去上课。在党校的学习内容,有党建,统战和群众工作,学习四个月。结业后,原说去彭雪枫部,又说去大别山李先念部(陈少敏去了),以后临时变动,予西来电报,让回予西(这是夏季)。于是,我就又回到了巩县。我去以前成过县委会,开过三次会,回来时,县委的成员只有王桂五在,其他委员都走了,有调走的,有些自己走的。我找到王桂五,知道王在国民党的保长训练班上暴露了,刚回家教书。我与王共同召集党员到我家开会,张西曾去了,又成立了以王桂五为书记,我为组织委员,贾书斋为宣传委员的三人中共巩县委员会。接着,成立了孝义、康店等为一片;站街为一片;鲁庄、西村为一片的党组织活动点,发展新党员孟庆友、孟毛兰(宪琰)、张凤娥、于泰宏等都是这时发展的。全县党员总数很快超过100个。当时的师范学校、中州学校有孟庆友、孟庆禄、周四卷负责;新心学校和县中还没有党的组织,但新心学校校长王汉三,教师焦秉章是党员;师范有了党员赵朝庆、于兆宏、王同章。遗爱中学党员最多,有20个吧,孙永瑞是支部书记,他是在秉礼学校入的党。新心学校教师尚传统是北京市教育局局长韩作礼(南阳人)亲自发展的党员,是组织交待留在巩县的,与本人没关系。解放后应该给予恢复党籍的,可没有办理成,尚已死了,没人管了。1940年春,又整顿了党组织,

有些自己不干了,有些开除了,虽说开除了,也不给本人说,还要观察一段时间,整顿后全县只剩党员五十多个。(孟曼溪被整顿掉了,他在中州学校写个思想不坚定的文章,中州学校周士卷是党小组长,他对我说:以后就不说曼溪的党员了。后来,曼溪上黎明中学,在竹竿川,曼溪也没作过暴露组织的事。解放时,曼溪跑到开封,开封解放后又回来,去县中当教导主任。

皖南事变,形势大变,中央通知,组织要解散隐蔽。县委解散后,下边党员互不发生联系,因此,巩县组织没被破坏。偃师、密县都被破坏了,偃师的一个组织部长当了叛徒,牵连到我县张锡琚,张锡琚被捕后受刑不过,交待了几个明头党员(王桂五和我等),当时都不在巩县,因此组织没受到损失。

巩县的党组织解散后,我去找省委,省委也从竹沟撤出到延安去了。具体地点在陕北马兰,可当时国民党封锁很紧,进不到延安,只好到宝鸡找活干。1942年秋,我与康惠民一路到了马兰,在省委安排下,在那里学习,劳动一段时日后,省委安排我回巩县,让我了解情况,隐蔽精干,把骨干带回延安,我回来后,找了一些人,向延安去时,有些不敢去,脱党了。周思卷(玉敏)、康维谦(苇军)、焦瑞甫、孟毛兰都去了。当时组织不同意你留下,你不走,后果你自己负责。可在1943年,因封锁更紧了,我们只能在陕甘宁边区的外边转,就是进不去。孙庆瑞、焦丙章在归德、焦茂元在广元在宝鸡磨面,后来孙庆瑞、焦丙章到底也没进到延安。

1944年,日本到予西时,国民党慌了,找共产党谈判,边区封锁松了,我才趁机去了延安,从宝鸡起身,火车通到跃县,穿着商人衣服,也没人问,更没人查。进了延安,后又到马兰,省委已撤到延安,抢救运动还没过去,省委的人还被关着审查(我们县原先到延安去的焦瑞甫、孟毛兰等一到就被抓了起来,属保安处的重犯、一个人一个窑洞,不准出来,屙尿都在里边)可是没有抓我,我到关中地委,又介绍到中组部,中组部部长彭真,秘书王鹤寿又把我安排

住到胡耀帮的总政招待所,也没禁止自由。实际对我开始了内查外调,社会保安处长周兴林,找我谈话多次,最终没查出问题,放了。焦瑞甫、王桂五、孟毛兰等在延安审查后,也都放了。焦瑞甫的结论是好党员,孟毛兰的结论也不错,毛主席在党校礼堂脱帽向同志赔不是,说大后方是国民党统治区,十万党员是恩来领导的,是好的,不是红旗党,当时不叫平反,叫甄别。我被审查后,彭真主持给下了结论,参加革命以后,是为党作出贡献的好党员,重新入党没有后补期。我不服,又找廖志高,又查清,使我全部恢复。彭真笑着对我说:“你这问题没啥说!不然会让你上中央党校学习!张正兴是营级干部还不能去哩!”

巩县过去有党员,没组织,后建组织时比偃师的党员少的多,但巩县党没有遭到大破坏,以后撤退,线也没断。所以皮定军到巩县后,找到郝纯标(在偃师入党)、刘天若、邳文升、张望楼、曲子万、齐盈生(老党员,掉了队,是崔济民发展的)等人,大部分是原来发展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巩县跟着皮司令能出去两个团是与过去的基础分不开的。皮定军走后,还乡团大肆镇压,使原参加革命的同志,家属及群众受到残酷迫害。实在令人发指。

1946年春节过后,中央宣布让我们去东北,但我们从延安出来之后,又下令让我们临时回华中、回河南。张雪林和我一路,到邯郸后,晋冀鲁豫中央局(邓小平负责)的干部科科长刘建勋说让我们停停,于是就停在那里了。

1947年麦收前夕,接到命令,要我与焦瑞甫一道过黄河,要我到巩县负责工作,焦瑞甫到南京找杨章武。就在接到命令的当天夜里,我与焦瑞甫自洛阳北岸一块坐一条小渔船过河来。刚到岸边。国民党的两个巡逻兵用电灯向我们照射说:“有情况,有情况!”我们二人赶快爬在水中草窝里,岸上一个兵犹豫不定,后来他们说“没有什么,刮风哩”,就走了。我们才上岸,天不亮,到了我们交通站的家,洗洗,换衣服,到洛阳搭火车,戴礼帽,持通行证,样子象士

绅。在火车上，与李松茂（职业特务）坐个对面，焦对我使眼色，我到偃师就下车，从后岭上转到巩县。在巩县了解了敌、我、友情况，作些统战工作，不久，陈赓、谢富治大军就过河来，巩县第一次解放。为了工作，我就同徐宝珠离巩，前往渑池、嵩县。可是横水之役，陈谢大军吃了亏，又围了洛阳，毛主席叫撤退，国民党又回来了。我与徐宝珠去油店，找保长滑建华，滑是我们的积极份子，陈谢大军撤退时，我们又到孟津住了一晚，后到洛阳北牛庄，保长的儿子带我们到了新安、渑池，那里还是解放区，找予西地委，见到邵文杰，他当时是组织部长，又碰到刘道安书记和军区司令员，他们都说让我留在那儿！而我是要找组织关系，这里找不到，我就到千秋，住一晚，又往西走，被民兵抓起来，捆起来。李一民在渑池县委当书记，说：老徐，你咋在这？就放了，并把他骑的马让我骑，到渑池，焦建功（瑞甫）在那里当城区区委书记。李一民让我留那当区委副书记，我说不在那里干。我又到嵩县找前委、找组织关系。地委书记史向生发报向有关部门询问我的组织关系，都说没有。宝珠与另一人去某地起枪，被人家打死一个，宝珠跑回来了。我和宝珠在路上碰到土匪，一个河北过来的民兵跑远了向地主武装开枪，使我们逃脱。当时敌人喊着捉活的，我就考虑，滚到山沟也不能让活捉。后攻洛阳，进城时还下着小雨，陈士榘指挥，从华东带来的炮兵。但城里主要是青年军，思想顽固、组织严密，装备精良。为了不使工商业遭到破坏，几天后，中央又令撤。在洛阳一听说撤，我就想过黄河去太岳找组织关系，可在这天夜里又见到邵文杰，邵说：你的组织关系早交到这了，你就到洛阳当县长吧！我不干，只要组织关系，邵把组织关系交给我，我装入口袋，即到洛阳市委找谷景生书记，而谷景生却说，他也正在找我哩，他对我说：你快回巩县，走得晚，就跟不上，马上成立县政府，出布告，当县长。当时还没有地委，也没有武装，直接受陈赓领导，陈赓给写个证明信，我就连夜赶到黑石关，下车后吃一顿饭。了解了一些情况，让黑石关饭馆的老板去找孟庆友、焦

克复、张呼兰等。第二天就出布告，成立了巩县人民民主政府，布告是徐宝路写的，县政府大印是姓白的刻的。

1948年成立中共巩县委员会时，到会有50多名党员，在东侯开会，这次会议宋清文、张凤亭参加了，地委书记陈耳东来了，选了6个委员，这次会议王桂五没有参加，但被选为书记，我被选为组织委员。石跃南为统战委员。他曾在北山口、站街发展党员。

由于巩县有过去的工作基础，成立县政府后，没有出现大的反复，只在孝义牺牲两个同志，鲁庄牺牲一个。在孝义的凶手叫李有文，李有文在兵工厂参加过共产党，以后在郑州参加了敌人的特务机关，与吸大烟的李道生勾结起来作的祟。我们二同志也是没经验，睡在门板上，头朝外，枪挂在墙上。鲁庄案件是王殿臣干的。

成立县府后的头两件事是：一要让学校开学，二要出布告，唱大戏。这些都是为了稳定人心。

巩县学校工作开始的早。由任知时等人出面，联络一些在家的学生：刘绪袍、景超群……到年底，就恢复到20多所学校。当时华北大学，中原大学都在招生，实际上都是干部学校，巩县也有人去。我们的想法是：只要没政治问题，能留到本县的就留下来。那时人们缺乏对时局的正确认识，害怕政局反复不敢出来工作，荥阳离敌占区近，教书都没有人敢教。张玉昆动员他外甥参加革命，他姐要跳他窑头，说把她的孩子推到火坑。而在我县，由于利用知识分子作工作，所以知识分子出来的就多：刘贵一、焦廷才、刘元善……当时，敢出来就中。当然，也有不少就不见面。目前为啥巩县离休的多？为啥巩县烈士多？为啥开封地委干部三分之二的人是巩县的？为啥开封地委的女干部中巩县占百分之九十？（巩县被讽为“丈人县”？）就是我们县刚解放就敢于动员，鼓励知识分子，年轻的知识妇女参加革命，在火热的斗争中成长起来了。

县政府成立之后，孟庆友是一区区长；找张凤娥成立第二区，干部全是石灰务人；熊安良在回郭镇成立第四区，代管三区（芝田

区),后康方真去三区当副区长,很快南下来一批老同志,陆续成立了站街第五区,区长是岳承先;六区是涉村区区长是李五;鲁庄成立第七区,区长李治。当时荣汜广县委还没有地盘,就把米河、小关成了他们的区域,他们的县委、县政府就设在新中乡张诰家。后郑州解放,才把米河、小关回归巩县,成了八区,区长是杨福祥。

当时还有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征粮支前,九纵在巩县境。黑石关的过境税,回郭镇的烟税,我们收了,财务人员把它捆起来,都交给秦基伟的第九纵队。印象最深的就是从刘茂恩家弄出的很多东西:大烟土、白银元等,三匹骡子拉 23 车,起了大作用。大烟土到敌占区换药品很方便。

刘茂恩家是秦基伟派个营长带人去搜查的,弄出不少大烟土、银元、金子不多。在家中一孔窑里脑藏的。他娘的棺木弄出来后,原以为棺材中放的是枪支,就撬开了。他们报到县政府,我认为这不符合政策,就叫那位营长快把刘茂恩他娘埋掉。后党中央来电报:处分那位营长。因此,刘茂恩的弟弟刘老七说:“和共产党不共戴天。”他们一家都跑到台湾去了。刘茂恩小时家里很穷,他父亲曾说过养不起,在他出生时就要浸死他,他家姊妹十人,被子上七个大窟窿。老大刘镇华是个秀才,老二做生意,老二死后,由老四管家,老四、老五(刘茂恩)都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老四是骑兵团长,老五是个营长,后来依靠他大哥刘镇华(镇嵩军司令)步步高升,当了军长,抗日时期升为第四集团军的总司令。

1949 年秋天,大军南下开始,中央政策允许带知识分子,后来通知:县以下不能带(陈福林,那时小孩,现在是广西自治区书记),可又说对外支援可挑些好的。实质上是根据当时领导人的意思,顺手的留下,不顺心的推出去。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随军南下的,到武汉停了一段,长沙尚未解放,在武汉就宣布了广西省各县干部名单,我于 1949 年冬到广西柳城县当县长。干五个月,土匪猖獗,调任柳州专区公安处处长。柳州市法院分院院长,当时正在镇压反

革命。又到钦州当县委书记，钦州是广东新拨给广西的一片地方，一边临大海，一边临越南。后到工矿，先是广西木硅锰矿当经理，后调自治区工业厅任基建处长，帮柳州钢厂搞基建，又调柳钢一公司当经理，又调自治区排灌局当局长，农机局副局长。在1957年反右时，因我主持工作中划右派较少，曾被批判多日，后得到省委的开脱，没得开除党籍，严重警告的处分也没戴上，问题一直留到文化大革命。大跃进时，我在柳钢的一个基建公司当经理，不懂行就去东北、北京请工程师。我当时就对广西壮族自治区书记刘建勋、副书记韦国清说：“这样干，行吗？！瞎吹！到时候把责任推到你们身上，你们注意点，脑子清醒点。”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会议精神一传达，我脑子转圈，我认为彭德怀说得对，但我一言不发，传达文件一字不拉，一字不添，不解释，任凭同志们去领会。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被作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叛徒，现行反革命”被批斗。巩县的造反派也遥相呼应，转去了好多揭发我的所谓材料。特别是接替我的巩县县长曹干军和张毅揭发我贪污刘茂恩家的大烟土之事，更是重型炮弹，于是使广西的造反派把我作为特大老虎打。那里在文革中打、杀厉害，但我坚持不顶不碰，就是一个“我不知道”。广西省委也不信，就这在那泡了十几年，粉碎“四人帮”后，我由柳州回到南宁，省委任命我为省农机局党委书记，我没去上任，一直向中央如实反映情况，几个坏头头都被我告倒了。我于1985年离休。关于咱县共产党在解放前的活动和我的简单情况就说到这吧。

我现在说点我记忆中的老事儿：说巩县地灵人杰，也许有些自夸，可实际上，与周围的县也确实有所不同。清朝末年的举人，河南省以巩县最多，如任同堂、宋景玉、薄均亮、薄芝太等……。前后20多人，全省一榜只82人，有一次巩县就有7人。民国初年，在省城开封留美学堂（高中），巩县学生也占一半。办学堂、剪辫子、放脚、打神庙等等，许多项都跑在前边。巩县因为有文化基础，就容易接

触新思想,追求真理,向往先进,献身事业创出成绩。清末举人任同堂就对我说过:“国民党光说共产党坏,为什么那么多的有学问的人都朝那边跑?为什么越打越发展?因为有知识的人,他们见多识广,是不会长期受蒙蔽的。“救国、救民”这个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会使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做出正确的人生选择。”这话说得不错,虽然我们党也有统战工作,但是应该承认许多有钱人及其子弟同情革命或参加革命,是和他们的思想文化素质不能分开的。任善忱是阔公子参加了革命;孟毛兰家也是富户,可他入党了;康旭东是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其儿子康学礼,参加革命,后任总后副政委;康永庆也是富农(后破产),他儿子康午生(即王国权)参加革命,成为驻外大使,民政部常务副部长。康旭东是地主,康店学校校长,四个教员,其中三个地下党员,康维乾、康华军、康清照,后来还有张凤娥;陈宪章曾扬言要抄康维乾家,康旭东也放风说:你敢来我村一步,要你的命,陈也不敢去了。地主资本家张浩,他的问题是圈子窑,可他也资助过皮部,他的儿子参加革命牺牲了,但烈士名上没有人家,是不公平的。张和勋设计把张望楼骗到家后,被姚云亭枪杀。活埋前还派人去征求张和勋的意见,张说:越快越好。张和勋怕张仲鲁来救张望楼。还有出身于富家的康惠民是一机部司长,交通局局长;史向生出身也不好,任农垦部副部长。补充说明一点,张和勋在侄子张望楼上山加入皮部时,曾是伪县党部的书记长。康旭东也是干伪县党部书记长,都为人民办过好事。要说刘镇华,原来也是办学堂,兴教育,后来成了军阀,卷入政治漩涡,走向反面了。

这些是进步的一面,还有反动的一面。比如买举人,也即买顶子,争权夺利,有权有势与土地主结婚,土地主就受欺侮,见面点头哈腰,恭恭敬敬。没兴保甲制前,是封建地主当权派直接统治,叫局子。自从闫作太提出实行保甲制后,当权者不直接出面,顾几个人干那抽壮丁,派差等麻烦事,当时,多数保长是雇用的,是当权的地主都不干,土地主他不敢干,邵方就是被雇用的保长之一。还有一